本版编辑：龚 克
E-mail：z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124

中央党校作为党内教育的最高学府，几十年来，培养了数以万计知行合一、德才兼备、忠诚于党和人民、治党治军治国的栋梁之才。回顾中央党校的校史，可以更深刻地领悟“党校姓党”不是从外面贴予党校的标签，而是党校与生俱来的特质。

从中央党校校史看“党校姓党”

□ 谢武军

由中国的国情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情所决定，“干部恐慌”和“本领恐慌”一直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因而，早在建党初期，党中央就把开办党校、加强党内教育作为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通过在党校集中培训的方式，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政策的启蒙和再教育。194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征调干部轮流进党校学习的制度。这种学习制度一直坚持至今，为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党在组织上的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党校作为党内教育的最高学府，几十年来，培养了数以万计知行合一、德才兼备、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治党治军治国的栋梁之才。回顾中央党校的校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悟“党校姓党”不是从外面贴予党校的标签，而是党校与生俱来的特质。

中央党校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命运息息相关

中共中央党校的校史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的建设史休戚相关的。中共中央举办党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25年10月创办的北京党校，至今已有91个年头了。在中共党史上，党中央曾经三次决议办中央党校而没有办成。一是1926年2月中共中央曾决定在北京和广州两个革命中心各办一长期党校，称之为“最高党校”。但半个多月后，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局势急剧恶化，而广州忙于北伐，两个最高党校都没有办成。二是1927年中共五大期间曾设立“党校委员会”，书记瞿秋白，并决定在武昌创办中央党校，招收学员300人，学期6个月，7月30日开学。但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形势急转直下，中央党校未能办成。三是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决定“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地培养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但由于张国焘的分裂破坏，高级党校也未办成。

1925年至1934年，中共中央大部分时间处于地下斗争环境，在自己掌权的区域只呆了不到两年。中央举办党校受客观条件制约，带有临时性、规模小、无持续性、无固定校舍、专职教员少等特点。北京党校、两湖党校和中央训练班都是秘密举办的。1925年的北京党校尚能以“北京职业补习学校”之名向北京市教育局申请注册，1929年的中央训练班则完全处于地下，连校址亦不可考。中共中央局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建党之后至抗日战争之前党中央举办的规模最大、存续时间最长的党校。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办学19个月，校址迁移三次。随着中央苏区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葬送，学校被迫停办。

中共中央到了陕北之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革命凯歌高奏，中央党校经历了11年另3个月不间断的稳步发展的时期。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头，敌后根据地大幅缩小，党中央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将大批干部调回延安保留培养，使中央党校一度达到学员3000，工作人员3000的规模，可谓兴旺发达。当年，毛泽东曾感慨道：“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更会想到这个时候吊儿郎当不注意学习是不应该的，那时候就会后悔的。”在延安的十年，是中央党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并于1943年3月到1947年3月亲自兼任校长。

1947年3月至1948年7月，因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撤离，中央党校停办一年有余。1948年11月马列学院（即高级党校）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开学，1955年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中央高级党校集中了党内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在理论界享有盛誉，是名副其实的一流学府。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国家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党和人民遭受浩劫，中央党校停止招生，校领导遭迫害，教职工被下放，校舍被占用。“文革”结束之后，随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国家日益繁荣昌盛。中央党校1977年3月复校，平稳发展至今。

由是观之，中央党校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央党校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党的兴衰，也反映了国运的兴衰。

中央党校学员的构成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状况的缩影

从学员来源看，中国共产党是由点到面发展起来的，大革命时期，党员数量不多，尚未形成全国的组织系统，党的经费也十分紧张，中央举办党校不可能面向全国招生。北京党校60人主要来自北方数省，两湖党校80人来自湖南湖北。土地革命时期，红白区域割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员主要来自中央苏区各省。初到陕北，中央党校学员以长征干部、陕北干部为主，中国共产党亟需“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

抗战初期，党组织迅速发展，党员数量从1937年初的4万多人猛增到1940年的80多万。据1941年9月15日《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二学期（5月11日起至8月30日止）教学工作总结》统计，1941年第二学期在校学员638人（未编班者49人未计算在内），学员籍贯覆盖了23个省。其中：河南68人，占10.66%；河北65人，占10.19%；山东22人，占3.45%；山西54人，占8.46%；陕西111人，占13.4%；浙江12人，占1.88%；福建9人，占1.41%；广东26人，占4.08%；安徽17人，占2.66%；湖南38人，占5.96%；湖北32人，占5.02%；江西36人，占5.64%；广西5人，占0.78%；云南3人，占0.47%；贵州5人，占0.78%；四川71人，占11.13%；绥远2人，占0.31%；甘肃5人，占0.78；江苏37人，占5.8%；辽宁10人，占1.57%；吉林8人，占1.25%；黑龙江1人，占0.16%；西康1人，占0.16%。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已经完成了“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从这份学员情况统计看，完成这个任务的时间节点在1936年至1939年，这四年入党的学员408人，占学员总数的63.95%。其中1938年入党的206人，占32.29%。这一学期还有大革命时期的党员11人，实属凤毛麟角。1932年和1933年入党的学员55人，占8.63%，而这两年正是土地革命的高潮期。

从学员成分看，建党初期的党员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少量工人，因而北京党校和两湖党校的学员成分以学生为主，大部分是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成分占了党员的绝大多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员成分也以农民为主，大部分是1928年以后参加革命、有一定斗争经验的苏维埃县区级干部和红军基层干部。延安时期学员成分多样化了。1941年第二学期638个学员中，工人150人，店员4人，学徒12人，职员6人，自由职业3人，农民150人，学生236人，教员33人，军人28人，其他16人。学员成分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扩展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但其主要成分仍然是工人（包括店员、学徒）、农民和学生，共占86.64%。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员成分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党内出现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因而党内教育问题必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从学员文化程度看，其变化呈马鞍形。北京党校和两湖党校学员文化程度较高，瑞金时期和初到陕北时文盲达半数以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首开文化课，教授语文、算术、历史、自然地理常识。大教育家徐特立、大学教授成仿吾都讲过文化课。许多学员在党校不仅学到了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而且揭掉了文盲的帽子，变成了有文化素养的人。

延安时期，随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批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学员的文化程度也随之提高。1937年至1941年中央党校55个常规班次中，需补习文化的只有两个少数民族班和8个文化班，占班级总数的18%。1941年第二学期，未上过学者104人，占16.3%。在1942的正科，以及1943年后的一部、二部，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上。比如正科第三支部32个学员，大学文化程度11人，高中6人、初中15人。从马列学院第一期开始，学员实际文化程度都在高中以上。“文革”十年浩劫，国民教育停滞，党员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也随之下降。1982年中央党校再次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文化班，为一批思想路线端正、有实践经验的高中级后备干部补习文化。

从学员工作性质看，瑞金和延安时期的学员来自党政军群文等部门，而以做党的工作的干部为主。比如，1941年第二学期学员中，在省、特委、县、区、支部、小组做过党的工作的共423人，占66.2%。做政权工作的仅14人，其中省级1人，县级7人，区级5人，乡级1人。这和中国共产党还是革命党而不是执政党的地位相符。这种状况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从学员的层次看，北京党校、两湖党校学员主要是刚参加革命的党团员。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高级班共办三期，学员为县团级干部，总数不到100人。1935年底至1941年底，中央党校学员以县级干部为主，高级干部不到20%。在1942年的中央党校正科和预科，以及1943年以后的一部和四部，学员皆地委和旅级以上高级干部。比如，正科第三支部32个学员都是地委以上的干部。其中，12人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从各根据地来的15人，中央机关的5人。地方工作干部26人，军事干部6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10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7人，大革命时期的5人，跟着毛主席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1人（刘型），1928年留苏的1人（罗少华）。参加革命工作最晚的也在1937、1938年，共8人。这种层次的干部在1944年7月的中央党校达1100多人。

回想192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曾有一个统计：“全国至少需要区执委、地执委、特支干部355名，而当时只有120名，为实际需要的三分之一。”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随着党、军队、根据地的壮大和巩固，党的干部队伍在数量质量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高中级干部成为中央党校轮训培训的主体。

综上所述，党校与党本是血脉一体的，党校因党而立，党校为党而存在。坚持“党校姓党”，按党章党规党纪办学办事，是党校应守的本分。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文史天地

蛟龙笔翰生辉 妙处难与君说

——中央党校校园内楹联续解之三

□ 赵腊平

在中央党校第一餐厅东门，有著名书法家郑诵先手书的另一幅楹联：

“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

这幅楹联出自李白诗《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这首诗是李白在被贬去夜郎（今贵州桐梓）的路上，听闻自己已被赦免，高兴之下写下的即兴之作。

史载，至德三年（758年），五十八岁的李白因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流放。乾元二年（759年）三月，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下令“流罪以下一切放免”，此时，李白已在船上待了15个月。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他终于获得了自由。这对于李白来说太意外了。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写下这首有名的《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

李白认为自己又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于是产生了很多的幻想，期待皇上能再次重用他。因此，他在《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写道：“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可见，中央党校第一餐厅东门的楹联“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正是引用了这其中的两句。

“七泽”：相传古时楚有七处沼泽。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说：“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后以“七泽”泛称楚地诸湖泊，一说“七泽”在湖北。

“三湘”：湖南有“三湘四水”之称。前人习惯于把湘水流域分为南北两大地区，以湖南省南部、湘水上游“潇水”流过的地区为“潇湘”，以衡阳以下，“蒸水”所注的湖南省北部为“蒸湘”，再加上代表湖南西部沅、澧二水流域的“沅湘”，便有了“三湘”之称。“四水”则指湘、资、沅、澧四水。

诗作的大意是：我困在被流放去夜郎的船上，已经有很久没写过诗歌了，时间一长，琉璃砚中的墨水都干枯了。如今在巫山阳获悉皇上大赦了我，我那生花的妙笔仿佛又恢复了青春，宛如蛟龙一样生气勃勃……**我真想咆哮几声，让咆哮的声音响彻云霄，飘扬在楚天的七大湖泽；我真想大声歌吟，让歌声回荡在三湘四水。**

众所周知，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他的诗内容博大充实，笔势挺拔雄俊，骨气刚劲有力，感情热烈激扬，无不给人以豪爽淋漓、雄迈大气、超绝世俗之感。在这首《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中，李白以陷狱改判长流夜郎因心情凄苦未能写长句而抱恨不已。而当赦放巫山之阳，他又诗兴大作，“琉璃砚水长枯槁”的昔日大可不能与“蛟龙笔翰生辉光”的今日相比了。他希冀着“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的大好时机到来，也想借“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来表达他“高歌取醉欲自慰”之后，欲要“起舞落日争光辉”、大干一场的壮志豪情。也正是这种绝世的天才，展现了他排空驭气、奔腾不羁、泣神惊鬼的生命长度。

匾额为“爱惜分明”，出自续范亭《延安五老》诗：“爱憎分明是本色，疾恶如仇不宽恕。”形容爱和恨的立场和态度十分鲜明，体现了个人或组织及团队的立场、观点与人生追求。

这首楹联和匾额的启迪在于：一个人要干一番大事业，要为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就要站稳立场，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同时，一个人的一生中，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中，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此要始终不渝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要受得了挫折，经得起磨难，“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身居要职，就要牢记宗旨，一心为民；作为一般百姓，则要遵纪守法，为国分忧，勤俭持家。

“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

楹联位于中央党校水中亭南，书者为著名书法家王冬龄。

此联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七言律诗《寄殷协律》。全诗为：“五岁优游同过日，一朝消散似浮云。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几度听鸡歌白日，亦曾骑马咏红裙。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江南更不闻。”

这是白居易因怀念其江南旧游，即一位女琴师而写的一首诗。通过对过去与友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的回忆与现在作者不堪的境况进行对比，深刻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深深怀念之情和自己现今的孤寂之感。往事如昨，境迁人非，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堪称佳作。

这其中，“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的意思是说，**自从同自己如影随形一起游玩的朋友们分别之后，他们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飘散得无影无踪，再难相聚。那些弹琴作诗饮酒的同伴也都离我而去了，当雪花飘落下来，当月亮挂上天空，当花儿正开的时候，想与你一起分享这些美景。那个时候，一个人面对这一切，我最怀念的人就是你了。**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他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等。

那么，白居易为什么会那么长久地想念一个弹琴的江南女乐师呢？这应该与他喜欢音乐并有很高的音乐造诣有关。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诗歌和音乐，自古以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因为如此，古代诗人写的诗歌具有音乐般的韵律美，而且喜欢以音乐为题材，或者在诗词歌赋中间以音乐美的描写。但音乐本是无形之物，很难用语言文字直接描绘，故宋代著名词人张孝祥说，“悠然兴会，妙处难与君说。”

但在长篇乐府诗《琵琶行》中，诗人白居易将复杂多变的琵琶声描绘得层次丰富，音色分明，成功地再现了琵琶演奏的精彩片断：“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事实上，在《琵琶行》里，白居易不仅倾诉了“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之苦，也透露了自己“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的音乐天赋。据有关行家考证，白居易不仅仅是喜欢音乐，懂得音乐，而且对音乐的确很有研究，是真正的行家里手。他会弹琴，会弹筝，还有一副天生的好歌喉，唱起歌来，歌声嘹亮，感情深切。他“常与七弦为友”，“自我陶醉”。他认为音乐应为时政服务，“如知乐与时政通”，还主张“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正是因为白居易具有高深的音乐修养和驾驭语言艺术的厚实功力，他才能如此生动地将琵琶女的演奏过程描绘出来，并且听出其中的心声。

由此也不难理解，白居易和琵琶女之间的默契，在于两个人将各自的人生转折与不幸遭遇，通过音乐得到了交流和渲泄，也得到情感上的强烈共鸣。正是音乐，把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人联系在了一起，成了无须言谈的知音。而这，也许正是白居易对那位江南女琴师念念不忘的原因吧。

另据记载，自从1950年以后，毛泽东在闲暇之际，挥毫作字，手书古代诗词。从传世的墨迹来看，老人家就曾手书白居易的《寄殷协律》，且似为1955年以前所写。可见这首诗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有行家评论：毛泽东手书的《寄殷协律》跳宕性情，柳暗花明。章法气韵均佳。“五岁优游”，首字有力有韵，“抛”字动感特别，似急旋掷球，力在形外。后三行，露锋较多，显得飘游浮动。而这个时期，正是老人家书风成熟，走向巅峰的时期。所以，这些书作，艺术性极强，是他一生书法艺术的精品。

有意思的是，白居易的诗不仅仅在国内广为传诵，在东瀛日本也颇受欢迎。据专家研究，平安时代是日本文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吸收中国汉文化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日本对中国汉文化的吸收奠定了日本平安文学蓬勃发展的基石。当时的吸收涉及了许多的领域，这其中汉诗的传入是决不可忽视的一项，而白居易所做的诗歌的传入量更是个中翘楚。

1968年，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讲演中，就曾引用了白居易“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这两句唐诗，来形容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并用其中的“雪月花”三个字来概括日本文化中人与自然万物交互感念、密切交流的“物哀”传统。如今，“雪月花”已成为日本的惯用语之一，泛指自然界所有的美丽景物。

悬挂于中央党校水中亭南的这幅楹联，其上还挂有一方“妙造自然”的匾额。这“妙造自然”四个字很是了得！它出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妙造自然，伊谁与裁。”意谓艺术追求自然而然，又看不到人工痕迹。李苦禅也说，“会须意兴所至，信手挥洒，心纸无间，笔墨契合，才情风发，妙造自然。”

“妙造自然”是中国美学关于艺术与自然审美关系的一个传统命题。它以“天人合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心物交融的独特视野看待艺术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强调只有直面自然时，才可以自然地领略到自然的生命，领略到人类“妙造自然”的风韵。因此蕴涵着丰富的美学意蕴，具有普遍的艺术创造原理的意义，堪称中国艺术理论的精髓。

（作者系中国矿业报社副社长、副总编）

学员作品

登千萃山远望亭

□ 彭佩文

千萃山巅远望亭，
浑然融入五园群。
登临望远千山绿，
俯首近看万寿青。
今古名园成一体，
龙亭慧海两相迎。
山青湖秀南来水，
天地和谐万木春。

冬湖野鸭

□ 彭佩文

冬湖野鸭不南飞，
生态校园美上催。
掠燕湖设放氧机，
水暖冰融鸭巡回。
轻洒饲粮怯怯离，
群鸭低飞衔爱粒。
珍爱野生须尽力，
绿色家园众人培。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 照排：中央党校报刊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